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兰州大学“985工程”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丛书

郑炳林  
杨富学

主编

Series of Ethnic History  
and Culture in Ancient Northern China

## STUDIES IN THE SHAMANIST CULTURES OF CHINA

# 萨满文化研究

张碧波 庄鸿雁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丛书

郑炳林  
杨富学

主编

Series of Ethnic History  
and Culture in Ancient Northern China

# STUDIES IN THE SHAMANIST CULTURES OF CHINA

---

## 萨满文化研究

张碧波 庄鸿雁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满文化研究 / 张碧波, 庄鸿雁著. --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1. 4  
(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5421-1854-7

I. ①萨… II. ①张… ②庄… III. ①萨满教—宗教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9269号

书 名: 萨满文化研究  
作 者: 张碧波 庄鸿雁 著  
责任编辑: 刘新田 瞿广业  
装帧设计: 马吉庆  
出 版: 甘肃民族出版社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发 行: 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印 刷: 甘肃天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9.5  
字 数: 452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21-1854-7  
定 价: 38.00 元

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或无文字现象, 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

邮编: 730030 地址: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网址: <http://www.gansumz.com>

投稿邮箱: [liuxintian@yahoo.com.cn](mailto:liuxintian@yahoo.com.cn)

发行部: 葛慧 联系电话: 0931-8773271 (传真) E-mail: [gsmzgehui3271@tom.com](mailto:gsmzgehui3271@tom.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缘 起

郑炳林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作为 20 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地之一，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主要部分流散到国外，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劫余部分收藏在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等单位。敦煌文献中除了汉文文献之外，还有很多非汉文文献，如梵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藏文等，特别是藏文文献以其规模大、内容丰富一直引起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涌现出一批以研究敦煌藏文文献而著称的专家学者，出产一批非常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其他文献的研究也普遍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汉文少数民族史料的研究也同样成绩突出。汉唐时期敦煌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区，根据敦煌文献记载，这里生活的居民除了汉族之外，还有将近百分之三十是少数民族，主要有粟特、吐蕃、回鹘、于阗、达怛、吐谷浑、龙家、通颊等也生活在这里，而敦煌周边地区有很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南山、回鹘、于阗、唃末等，所谓敦煌四面六藩围，关于敦煌及其周边的少数民族的研究有很多成果，这套丛书就是集中了课题组的部分研究成果，呈现给学术界，以便今后研究中参考利用。

作为该工作发起单位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基地，早在 1979 年就建立敦



煌学研究机构,1983年筹建敦煌学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建立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1998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单位,1999年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2003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7年兰州大学敦煌学成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敦煌学还是兰州大学“211工程”,“985工程”二期、三期建设的重点学科,先后投入经费2200万元进行重点建设,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并逐步发挥其优势,在国内外敦煌学界发挥了引领研究发展的作用。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会(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Yale University)、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早稻田大学艺术学院、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成功大学等机构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与耶鲁大学联合筹建了国际佛教艺术与文化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以促进本学科向“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提高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水平。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1985年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目前拥有中外文图书7万余册,为本学科的科学研究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保证了敦煌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同时也对敦煌学界提供服务。还创建了敦煌学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网站,在条件成熟后为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提供网上信息服务。兰州大学拥有除本科以外

齐全的人才培养体系,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授权点,积极为学术界培养人才。截至2011年,出站的博士后6人,毕业博士67人,18人晋升教授(研究员),其中8人任博士生导师,24人晋升副教授(副研究员),38人获得国家基金项目支持。10余博士生得到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资助,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密西根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九州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深造学习,1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人博士学位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同时为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招收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留学生,先后招收的留学生有读博和短期研修两种形式,主要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南华大学、韩国国立汉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东北大学、东京艺大学、东京女子艺术大学、龙谷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前后接收留学生40余人,其中毕业的博士生2人,这些留学生普遍得到派出单位的好评。特别是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的联合共建,实现了优势互补,这一优势在双方的研究成果和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得到体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担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120多项,经费1000多万元。陆续推出了一批学术丛书,主要有“敦煌学研究文库”、“敦煌学博士文库”、“敦煌吐蕃文献选辑”、“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国际敦煌学丛书”、“丝绸之路石窟研究文库”、“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法国汉学精粹”和“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丛书”等,正在进行的有“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和“敦煌讲座”丛书。研究所编纂、出版的论著在学术界得到普遍的好评,分别获得中国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甘肃省优秀图书奖、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多项,研究成果



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2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发展是中国敦煌学吐鲁番学会扶持的结果,也是中外敦煌学界各位专家扶持的结果,因此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也是敦煌学界的共同学术研究基地和交流平台,希望在今后的发展中继续给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更多的支持。

# 序一

## 富育光

近期，得悉碧波先生大作《萨满文化研究》完竣，令人十分钦慕先生刻苦治学、锲而不舍的开拓精神。纵览中国古史研究，著述虽丰，然专论巫史信仰的名篇则鲜。公骥师曾嘱我博文强识，印象尤深者当推丁山先生于1932年在中央大学讲授《商周史》时讲义成书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资料翔实，为传世名作。然该书中，“巫”仍见之甚少。建国后，在古史研究中，“巫”似乎成了讳莫如深的词。我非常赞同丁山先生之语：“‘自然崇拜’，是宗教的发轫，任何原始民族都有如此共同的俗尚。”“回溯四五千年以前，中国人民所信仰的宗教，自发轫到完成，也是按照上述的规律一步步地发展，很少例外。”（引《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1页，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其实，任何国度、任何民族，初萌期的史学都与“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古史研究中，“巫”的观念形态渗透于各古史典籍，如《盘庚篇》等皆然。可见，“巫”的研究，在历史学、原始宗教学等学科研究中，要经常问津或不可逾越的课题。碧波先生通过中国巫史研究，进而探讨中原古史中的萨



满文化遗迹问题。作者运用大量古史考证资料，揭示“夏、商、周、秦、汉、唐、宋、明诸华夏——汉族王朝文化史中的巫史——萨满文化诸形态”，“证明这些王朝亦统摄在巫史——萨满文化圈中”，进而触及经历千万年不断文化整合的“中华文化传统的文化结构问题。”

《萨满文化研究》涉猎内容，上下五千年，地域广阔，民族与部落众多，经济与文化形态参差不齐，历史与文化的梳理工作量浩繁。这确实是一项庞大而极富有开创性的重大理论研究课题，无疑对往昔中国史学文化架构一次重新的审视和拓展。张先生年事虽高，仍文思敏捷，笔耕不辍，为史学发展的忘我献身精神，永远是我治学的师长和榜样。

“巫”字，象形字含意就是巫祝。按南宋徐梦莘所撰《三朝北盟会编》解释：“珊蛮者女真语巫姬也。”珊蛮即“萨满”。“巫”与“萨满”，只不过各民族在历史上称谓不同而已，其文化意义是一致的。追溯我国萨满文化研究工程，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对中国五十五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在广泛的民族社会调查中，在东北、内蒙、新疆等地区陆续触及阿尔泰语系不少民族世代信仰的萨满古老文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旨在挖掘和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参与下，对满、蒙、达斡尔、鄂伦春、鄂伦春、锡伯、赫哲、朝鲜及西北地区裕固等民族，濒临消失的萨满文化遗产实施抢救，成就显赫，在国内外产生良好反响。张先生将萨满文化研究引申入中国史研究，是无可非议的，我相信，《萨满文化研究》的出版，必将为中国古史研究带入新的动力，受到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界多学科学者的热心关注，为史学研究带来活跃的春天。

2008年3月23日

## 序二

### 杨富学

近期，本人应读者出版集团之邀，主编一套《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丛书》。在当前出书难，尤其是离退休人员出书更难的境况下，我自然想起了我素所景仰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巨擘张碧波先生。不久，便接碧波先生回函，知他正在撰写《萨满文化研究》一书，很快可以脱稿。对北方民族萨满教的研究，一直是我关心而饶有兴趣的课题，得到这一消息，使我非常振奋。

众所周知，萨满教是在原始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世界性原始宗教，有着广泛的群众性，流布地域广阔，遍及东北亚、北美、北欧。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区，萨满教影响也很大，有众多民族世代信仰、全民尊奉。萨满教延续时间很长，自旧石器时代晚期（通行的说法认为萨满教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即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兴起，发展演变至今，历千百年而绵延不绝，成为人类文化与宗教史上一个奇特且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术界对



这种原始宗教的研究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成果相对稀少，而深入系统的研究著作更少。碧波先生以耄耋之年，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让人感到可钦可佩。

碧波先生自上世纪 60 年代起就已开始发表在国内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学术论文，其本行是中国文学史，后转入中国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我和张先生的相识始自 1990 年，那时先生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七五”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先生当时有意让我承担敦煌民族文化史部分内容的撰写，遗憾的是，当时本人刚刚走出校门而至敦煌工作不久，对敦煌民族文化并不熟悉，此后不久又受遣赴印度德里大学学习梵文与佛教，一去二年，计划自然搁浅。等我回国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已正式出版，接着《专题文化卷》也推出。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的鸿篇巨制，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嘉惠学林。本人虽以未能与役其事感到遗憾，但曾应先生之约提供照片数幅，也算是略尽绵薄。是后，先生不以本人卑陋而弃之，而是常常加以提携、鼓励与支持。十年前，当我的习学集——《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出版时，先生正遭受脑腔梗、脑萎缩等病魔的侵袭，他以带病之躯慨然撰写长序向学界推荐，增辉良多，其情其谊，令人没齿难忘。

碧波先后治学勤奋而严谨，数十年如一日，孜孜矻矻，笔耕不辍，并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学术体系和史学观。他认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多为草原游牧民族）对中国文化史有特殊贡献，对其文化进行研究，有助于打破我国史学界长期存在的重华夏——汉文化而轻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故而着意从中华民族观、中华疆域观、中华文化观的综合视野，全面整理研究北方民族文化，宏其声而扬其

气。同时，张先生认为对中华文化的研究，必须重视区域文化与诸民族的个性文化，提出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原黄河文化是其中心，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诸多区域文化与之并驾齐驱，在发展过程中既呈现出个性特点，同时又相互激荡，最后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的大中华文化。这些思想在他主编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中都有充分体现，是中国民族史、中华文化史研究上的创举。

张先生对北方民族文化的重视是持之以恒的，继《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之后，他又先后推出了如下多种专著：

1.《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2.《东北民族与疆域论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3.《中华早期文明的文化人类学考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4.《中国东北疆域研究》，张碧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5.《中华文明探源》（历史新视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这些成果将北方民族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尤其后两种著作，为研究萨满文化的形成问题奠定了基础。以张先生的谨慎、勤奋及深厚的学术素养，更兼身处萨满教流行的东北地区这一优势，致力萨满教的研究，必能披坚执锐，开拓创新。果不其然，没有多久，我便收到了张先生与其高足庄鸿雁副研究员合作撰写的书稿。拜读之下，受益良多。



由于本人对萨满教也多有关注，曾发表过几篇小作，<sup>①</sup>碧波先生遂嘱我为其作序。就年龄来说，张先生年届八秩，自是师辈；其学殖之深厚，人格之高尚，都堪称楷模，十余年来，我一直以师事之。学犹不及，安敢称序。然张先生不以在下荒陋，嘱托再三，固辞不恭，爰缀数言，勉副盛心，权充研习其大作的读书心得吧。

萨满教，原生形态当为巫，按照《萨满文化研究》之观点，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这种原始宗教的信仰特点是，崇拜众多的神灵。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供奉各种神灵，祈求各种神灵的保佑。

自然崇拜的对象繁多，诸如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草木湖海等。如锡伯族自然崇拜的对象即有天、地、日、月、星、古树、人参等。西夏党项人的自然崇拜，是以天神崇拜为核心的；而与天神崇拜相关联的其他形形色色的自然崇拜，如山神崇拜、石神崇拜、日神崇拜、月神崇拜、水神崇拜、龙神崇拜、树神崇拜、土地神崇拜等，也都颇具独特文化意蕴。汉族也有自然崇拜现象存在，考察《左传》，不难发现，春秋人所信奉的天空诸神主要有太阳、星辰、雨、云、雷等，包括天体、天象和气象。<sup>②</sup>哈萨克人认为宇宙万物皆有生命，均受着神的支配。神有两大类，即善神和恶神，善神给人带来好处和幸福，恶神则使人遭受灾难。他们特别崇拜天、地、日、月、星、水、火，每逢发生瘟

---

① 如《敦煌本突厥文 Īrğ 书跋》，《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 年第 4 期，第 104~105 页；《古代柯尔克孜人的宗教信仰》，《西北民族研究》1997 年第 1 期，第 130~137 页及《回鹘宗教史上的萨满巫术》，《世界宗教研究》2004 年第 3 期，第 123~132 页，等。

② 陈筱芳：《试论春秋自然崇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2 期，第 248 页。

疫和旱灾时，人们都聚集在河边或山包上，宰杀黑色的山羊羔祭献神灵。然后就在野外煮食这些祭祀的肉，并祈求天地消灾降福。每逢新月初升时，哈萨克人便对着新月祈祷：“愿日月怜悯，求新月赐福”。鄂伦春人则崇拜日月星辰与彩虹等，而且对山神（白依那恰）、马神（昭路博如坎）、草神（楚卡博如坎）、火神（透欧博如坎）也顶礼膜拜，同时又崇拜“恩古包”。恩古包包括三大神：“阿路狄达力”（雷神）、“毛鲁开依达力”（旋风神）、“根球鲁阿狄尔”（风神）。鄂伦春人认为雷神是一大神，若打猎不顺利或人生病时，都向它祈祷。对旋风感到神秘，亦生畏惧，故而人畜避免走旋风刮过的地方。

一般说来，自然崇拜约产生于血缘家庭阶段，当血缘家庭被母系氏族公社代替的时候，人们的血缘观念已在日常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人们相信同一氏族的人是最亲密的。为了区别本氏族成员与它氏族成员的不同，各氏族都有一个特殊的标记，这就是图腾。在我国北方古往今来的少数民族中，有不少都是以狼为图腾的，如乌孙、高车、突厥、回鹘、蒙古及今天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裕固族、满族等。高车人认为其祖源是一个女子“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的。<sup>①</sup>职是之故，唐代回鹘人在其国旗上常绣狼形象，称之为“狼纛”。直到今天，在维吾尔人的观念中，狼仍是福兆和吉祥的象征。人们常把狼的肋骨作为“伴侣”携带在身；让临产孕妇躺在狼皮上，认为这样生的孩子将会成为无畏的勇士；离家远行的人，在路上遇见狼，就会认为一路顺风，若遇见狐狸则自认为晦气，马上转身回家，不再随便远行。因为狼是勇敢的象征，故维吾尔人将男孩习称是狼。突

---

<sup>①</sup> 《魏书》卷103《高车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2307页。



厥人认为其汗国的统治者阿史那氏族先世为狼所生，故在“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sup>①</sup>图腾崇拜与图腾文化残余在东北地区多数民族中都或多或少有所保留，如满族的图腾除狼外，还有乌鸦、柳枝、野猪、鱼、鹿、鹰、豹、蟒蛇、蛙、鱼鹰等，鄂温克族则曾以熊、奥腾鸟、韩卡流特鸟、乌鲁卡斯鸟、海卡斯鸟、鹰、山、天鹅等为图腾，图腾神话、图腾名称至今仍存在，只是图腾禁忌已有所松弛。<sup>②</sup>

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人们的世系观念大大增强，对人的崇拜逐步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样就产生了祖先崇拜。如高车，其丧葬方式是“掘地作坎，坐尸于中，张臂引弓，佩刀挟稍，无异于生”。<sup>③</sup>以此方式寄托让死者灵魂永生的愿望。乌桓人、鲜卑人的葬仪是“肥养一犬，以彩绳纓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借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sup>④</sup>乌桓所谓的“神灵归赤山”，相当于中原人所谓的“魂神归岱山”。这里的岱山亦即泰山。可见，乌桓虽地处东北，与中原相距遥远，但神灵归山观念却几无二致。后世的契丹，祖先崇拜观念亦甚浓重。据载，契丹有一先主名迺呵。“此主持一骷髅，在穹庐

---

① 《周书》卷 50《异域传下·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 年，第 909 页。

② 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 48 页。

③ 《北史》卷 98《高车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年，第 3271 页。

④ 《后汉书》卷 90《乌桓鲜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 年，第 2980 页。

中覆之以毡，人不得见。国有大事，则杀白马灰牛以祭，始变人形，出视事，已，即入穹庐，复为骷髅”<sup>①</sup>。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阶级社会的产生，祖先崇拜逐渐成为萨满教全部宗教活动的核心。祭祖是为了得到祖先神灵的庇佑。在丧葬仪式和各种祭祀活动中，都包含着灵魂不灭的观念。直到今天，在东北的诸民族中都遗存有祖先崇拜的观念，如赫哲族人深信祖先的灵魂不灭，并且对活着的人有佑护作用。他们称祖先三代为“别布玛”，每逢春节时，都要在西屋供奉之。

宇宙万物都存在着神灵，但要使神和人得以联系起来，中间必须要有一个“中介”。大凡比较完备的原始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形成具有一定形式的神职人员来充当人和神之间联系的中介和宗教教义的解释者。碧波先生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巫覡被称为‘通天神巫’，是为通天阶级，是知天知地的智者、圣者。夏商和周文武建国文献史料中除了君王（君王为大巫、大宗教主）之外露有名字并有行状之人多为巫覡，多为中华第一代文化人，这是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鲜明特点。”这一观点从考古学上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据。如红山文化及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宗教性遗址、遗迹的发现与研究，表明当时已出现了较复杂的宗教礼仪和某种形式的巫师，而瑶山良渚文化的墓葬资料，不仅显示了男巫地位一般高于女巫，而且也反映了神权与君权集于一人的事实。考古证据说明，在公元前的三千年中期，巫术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信仰，专业巫师的滥觞已经出现，原始宗教正处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当中。及至商代，巫术已普及推广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故无事不卜不筮，无神不祭不祀。不唯卜筮医舞是巫术，

---

① [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首《契丹国初兴本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页。



甚至祭祀以及祭品、用牲，亦含有巫术意味。以卜筮而论，其权威超越人心向背与商王意愿，是最终的神秘力量。而凭借巫术力量进而握有政治决策实权的巫史集团，不仅是商代的政治精英，更是文化精英。因此，商代政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巫政合一，商代文化的特质可以总结为巫史文化。<sup>①</sup>正是由于上述巫政合一特点的存在，故而有人得出我国古代“君及官吏皆出自巫”的结论。<sup>②</sup>可谓得的之论。

就北方少数民族来说，巫的出现也是很早的。早在 5 世纪时，我国史书即对高车人中的“巫”有所记载。称高车人“喜致雷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高车斛律部首领倍侯利“善用五十著筮吉凶”。<sup>③</sup>这里的“巫”、“著筮”，在突厥语中称为 qam，亦即通古斯语中的“萨满”，自然属于那种能够沟通人与神之间联系的神职人员。12 世纪中叶，南宋人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卷 3 中引佚名撰《女真传》谓：“兀室奸猾而有才，自制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国，国人号为‘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姬也。以其通变如神，粘罕以下皆莫之能及……”<sup>④</sup>这是有关萨满的最早文献记载。

直到今天，裕固族仍把萨满称作 qam。qam 一词有“动”、“急动”、“震动”、“摇之向上”等意，另外还有“跳跃”之意。在满语中，“萨满”二字的意思是“兴奋的人”、“激动的人”、

① 刘乃寅：《商周巫史文化论纲》，《宁夏大学学报》1997 年第 4 期。

② 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台北：中华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 年，第 118～119 页。

③ 《北史》卷 98《高车传》，第 3271～3272 页。

④ 同一内容又见南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附录一》（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590 页。